走近夏代文明

詹子庆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　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夏代文明/詹子庆著.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
ISBN 7-5602-4585-4

Ⅰ.**走…** Ⅱ.**詹…** Ⅲ.**文化史—研究—中国—夏代** Ⅳ.K2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7886 **号**

□**责任编辑**：**包瑞峰**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曲　颖** □**责任印制**：**张文霞**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130024）
销售热线：0431—5695744　5688470
传真：0431—5695734
网址：http：//www.nenup.com
电子函件：sdcbs@mail.jl.c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长春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印装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148 mm×210 mm
插页：2　**印张**：10.25　**字数**：239 **千**
印数：0 001 — 1000 **册**

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可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十五·211 工程”项目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项目

献给亲爱的母校
东北师范大学 60 华诞

目　　录

一　夏史研究回顾…… 1
(一)夏史研究的历程…… 1
(二)夏史研究的主要问题 …… 11

二　夏史研究中文献资料的运用 …… 22
(一)《诗》、《书》中的夏史资料…… 23
(二)《左传》、《国语》中的夏史资料
…… 28
(三)古本《竹书纪年》和夏史 …… 29
(四)先秦诸子的夏史观 …… 32
(五)《夏小正》的史料价值 …… 37
(六)《山海经》和夏史 …… 39
(七)《史记·夏本纪》是夏史研究
的开山之作 …… 51

三　夏文化探索 …… 54
(一)前辈学者的先期研究 …… 54

(二)郑州二里冈遗址和郑州商城遗址发现的启示 … 58
(三)揭开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 59
(四)夏文化探索热潮的到来 …… 61
(五)夏文化探索的阶段性成果 …… 66

四 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原文明领先地位的确立 …… 74
(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历程的简要回顾 …… 74
(二)漫长的文明化进程 …… 82
(三)中原文明领先地位的确立 …… 87

五 鲧的传说和夏族的起源 …… 97
(一)鲧的传说 …… 97
(二)夏族的起源…… 101

六 夏史纪事本末…… 111
(一)大禹治水…… 111
(二)禹征三苗…… 124
(三)禹娶涂山女、禹会诸侯于涂山、
“禹葬会稽”…… 129
(四)禹铸九鼎…… 136
(五)“启攻益而自取”…… 140
(六)启伐有扈氏之战…… 144
(七)太康失国 羿、浞代夏 …… 150
(八)少康中兴…… 160
(九)夏朝的衰亡…… 163

七 夏朝的国家形态…… 172
(一)从族邦到王国…… 17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夏朝的国家机构…… 184
(三)夏朝中央与地方封国的关系…… 191
(四)社会阶层结构…… 195
(五)夏礼…… 200

八　夏代地理蠡测…… 205
(一)《禹贡》“九州”观念的形成…… 206
(二)夏朝的王畿和中心统治区域…… 218
(三)夏朝的声教所及…… 223

九　夏代邦盟探析…… 236

十　夏代物质生产和文化…… 249
(一)农业生产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252
(二)青铜冶铸业的出现和青铜时代的到来…… 256
(三)其他手工业制造和商业交换…… 258
(四)夏代文化…… 267

十一　夏代文明对后世社会的影响…… 284

参考文献…… 294

附表…… 305
夏朝年表…… 305
二里头遗址分期与常规^{14}C测年数据 …… 306
夏代中心区域图…… 307
夏代诸邦分布图…… 308

氏族名号索引…… 309

地名索引…… 311

人名索引…… 314

后记…… 318

一　夏史研究回顾[①]

(一)夏史研究的历程

夏史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　夏史文献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先期阶段

清以前的资料整理阶段。每个民族都重视本民族的世系，先秦时代关于五帝传说和夏商周三代的世系应有不少传本。现存《世本》和《五帝德》、《帝系》可能就是这些传本的遗篇。西晋咸宁五年(公元 279 年)发现的魏国编年史

① 因本书有专章介绍夏文化探索，故这方面的有关内容在此省略。不过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夏史研究离不开夏文化探索，关于两者结合方面的成果都侧重放进“夏文化探索”一章中去介绍。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了夏史世系、纪年和重要事件，这是战国时代魏国学者整理夏史资料的重要成果。司马迁著《史记·夏本纪》是系统整理夏史资料和夏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功不可没。篇中记录夏世系和夏史大事、禹贡九州等内容，必有所本，不能轻易怀疑。

此后西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夏纪》，宋人罗泌撰《路史·后纪·夏后氏》，都是在《史记·夏本纪》基础上，“博采经传杂书”，使夏史资料进一步系统化，但所取资料多来自古文《尚书》和其他再生资料，且加以神化，故其资料学术价值未必像《史记·夏本纪》那么珍贵。

清学者马骕（1621—1673 年）撰《绎史·夏史》四卷，内容有：禹平水土、夏禹受禅、少康中兴、商汤灭夏。该书取材于唐以前典籍，搜罗殆尽，系统整理夏史资料，便于研究者览阅查验。然本书所收资料真伪不分，谶纬附会之文夹杂其中，且把岣嵝碑误认为夏碑更是大错，每段后附作者评述，因受其史观所限，参考价值不大。

崔述（1740—1816 年），是近代以来疑古派的鼻祖，他著《考信录·夏考信录》两卷。这是一部挑战传统文献、在辨伪考信基础上试图建立可信的夏史系统的论著。书中表述他对夏史的总体看法是：“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继治然也”，“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太康后中衰，“仲康微弱，后相失国，夏政不行于天下也”。其说大致不误。他对夏史资料中来源于“伪书”和汉儒的一些谬说做了用心辨正，试图揭开蒙在夏史上的面纱，给后来研究者以启示。不过，由于受时代和辨伪方法的某些局限，他不可能真正做到求真，其主观臆断之辞常溢于言表。

2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和疑古思潮的影响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几位史学大师举起几面大旗，现分述如下：第一位就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1877—1927 年），他

在1925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课而撰写了《古史新证》[①]。书中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影响至为深远。其中有关夏史的论述，更为研究者奉为圭臬。现摘录如下几段以供体味：

>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

王国维一面主张要纠正“信古之过”，另一方面批评当时学术界存在着的“疑古之过”，他论述道：“乃拼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加以肯定可断言也。”（《古史新证》第1—2页）

《古史新证》第二章禹，以春秋时代秦公敦（簋）和齐侯镈、钟铭文为证，肯定文献记录的禹其人其事并非虚妄之言。书中述道：“自尧典皋陶谟禹贡皆记禹事，下至周书吕刑亦以禹为三后之一，诗言禹者尤不可胜数，固不待藉他证据。然近人乃复疑之，故举此二器知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古史新证》第4—6页）王国维对当时学术界怀疑禹的说法采排斥态度。

---

①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王国维先生首先用甲骨文证商史，发现于甲骨文上的商先公先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上的世系，“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最后，他提出对古书的一些看法：“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古史新证》第52—53页）

显然，这些话都是针对当时学术界出现的疑古思潮而有所发的，反映先生真乃独具慧眼，开了当时学术风气之先。

顾颉刚先生（1893—1980年）是国学大师，他创立“古史辨”派，于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在五四运动推动下，他对清理传统史学，批判封建道统，重新构建古史体系，培养出一批史学大师，功不可没。然顾先生受崔东壁等学者疑古思潮影响，后来证实他的某些观点有“疑古”过头之失。随着学术的发展，而先生本人在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也不断修正自己的一些看法。

他对夏史研究，主要观点有：

（1）他依据《说文》禹字解释，假设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后又假定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再后又认为禹的传说产生于西方戎族，原为戎的宗神，随着九州、四岳的扩大演化为全土共戴的神禹，更演化为三代之首君。对于禹为动物说，他晚年仍坚持不变[①]。

①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130—202.王煦华.顾颉刚关于夏史的论述//本书编委会.夏文化研究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124—12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他与童书业合写的《鲧禹的传说》和自撰的《息壤考》,对鲧禹治水传说的演变,认为最早文献记载,禹是禹,夏是夏,两者毫无关系。把鲧禹说成父子,鲧与夏发生关系,始于战国时代成书的《国语》与《左传》,鲧禹治水用不同方法,也是出自战国文献的记载①。

(3)他与童书业合写的《夏史三论》,论述启和三康五观和羿浇的故事是后人编造的,是传说,不是夏代的史实。②

(4)顾先生不怀疑夏朝的存在,他依据文献,对夏的都城和疆域作了探索,并试图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考古资料来印证夏的存在。

李民认为顾先生的学术观点后来有变化,"他到了六七十年代不但承认有夏史,而且非常赞成古史与考古发掘相互结合"。他列举 1974 年顾先生写给他的信为证,信中说:"偃师一地之新发掘,据北大友人言,龙山文化之下层为仰韶文化,有规模颇伟之建筑遗址,说不定是夏代物。按此地在洛阳东,洛阳是夏桀所都,见于《逸周书·度邑》及《史记·吴起列传》。洛阳之西,即秦岭,《左传》所云:'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侯皋之墓也。'则河、洛之间为夏代政治中心自无疑义。所恨者,夏代史迹无文字可证明耳。"③1979 年顾颉刚、刘起釪合写的《〈尚书·甘誓〉校释译论》(《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明确表示了中国古代不但有夏,而且对夏的地理方位与周围诸小国的关系给予了深入研讨。

实际上,顾先生已接受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这大概由于

①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88—138,199—201.

②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139—198.

③ 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99.

学术的发展，时势使然也。

郭沫若先生（1892—1978 年）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做出的杰出贡献更是有目共睹的。为纪念郭老诞辰一百周年，李学勤先生曾撰文《郭沫若同志对夏代的研究》（《中国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论述到郭沫若的史学研究贡献："郭沫若在甲骨文和殷商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早已为人所共知。实际上，郭沫若对于夏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也起过很重要的先驱作用。"这里主要指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夏禹的问题》[①]一文的发表（1930 年）。本文为呼应顾颉刚的夏史观所作出的反映，有赞同之处，但也提出不同的见解，他表述如下："照我的考察是：（一）殷周之前中国当得有先住民族存在，（二）此先住民族当得是夏民族，（三）禹当得是夏民族传说中的神人，（四）此夏民族与古匈奴族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 337 页）显然他肯定夏代的存在，但在研究态度上，他引用胡适的话："以山西为中心的夏民族，我们此时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只好置于神话与传说之间，以俟将来史料的发现。"他赞同胡适这种"比较矜慎"的态度。

在研究方法上，郭沫若和王国维一样，用金文资料参证，他列举春秋时器的两篇金文，即齐侯镈及钟铭和秦公簋铭。

齐侯镈钟金文："龢龢成唐（汤），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翦伐夏后，则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先生的贡献在于从宋以来把"夏"字误释为"履"，经过先生的解释把"翦伐夏后"与"处禹之堵"连贯起来，"则历来以禹为夏民族祖先之说，于金文上已得一证"。又举秦公簋金文："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绩，十有二公，在帝之坏，严恭寅天命，保业厥秦，使蛮夏。"据此，郭老认为"上言'禹绩'，下言'夏'，则夏与禹确有关系"。

① 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沿着这一研究思路走下去，2002 年保利博物馆征集到西周中期后段的遂公盨，上有铭文“天令禹敷土，随山浚川”等语，与《诗》、《书》语句相同，又证实了西周时代人对禹的认识。郭沫若用金文物证来研究夏史，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呼应。

另外，郭沫若还提出夏民族向北迁徙和夏与甲骨文土方的关系的看法，另外，推测夏民族别“有一部分系逃往南方”。以后，徐中舒、胡厚宣等诸位学者亦赞同此说，发表了相似的看法。

郭文结尾提出：“要之禹与夏就文献中所见者确有关系，此必为夏民族之传说人物，可无疑。又夏民族与匈奴族有近亲之关系，当为中原之先住民族。此事于将来大规模的地下发掘，时可望得到实物上的证据。”后来在他撰写的《奴隶制时代》一书中，[①]认为夏代“顶多只能达到奴隶制的初期阶段”。在夏文化探索还没有开展的情况下，他始终认为“关于夏代的情形，我们今天还不能够多说，且等待日后从地底下能有丰富的资料出现”。可见，先生对待夏史始终带着“比较矜慎”的态度。

即使到了 1979 年，“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问题已经提出，史学大师徐中舒先生仍然认为这是“夏史初曙”。如今夏文化探索已取得丰硕成果，有些问题逐渐露出水面，前辈们对夏代那种谨慎、科学的、实事求是态度仍然是当今学者学习的榜样。

3　夏文化的探索推动了夏史研究的蓬勃开展

徐旭生（1888—1976 年）先生是夏文化探索的开拓者。他的传世之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影响深远（1943 年初版，1960 年增订本，文物出版社）。书中第三章洪水解，列“大禹的治水”专节，对大

① 郭沫若. 奴隶制时代.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禹治水的范围和方法进行了研究，肯定夏王国的存在，并为夏文化的探索指明了方向。先生逝世后，由助手黄石林先生整理其遗著《尧舜禹》发表（刊载于《文史》三十九辑和四十辑），该文对禹其人其事作了进一步论述。徐旭生先生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在七旬高龄之年亲往洛阳、登封、偃师等豫西和晋南“夏墟”之地进行考古调查。尔后，二里头遗址、登封告成遗址及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就是在徐老踏察的启发下开始发掘的。

1978 年以后，随着夏文化探索热潮的兴起，夏史研究持续不断地深入开展。作为夏史研究的主力军，考古学家们探索夏文化、研究夏史的硕果累累，本书将有专章论及，而本节则主要介绍历史学家们参与研究夏史的情况。

徐中舒（1898—1991 年）先生较早把视线转向夏史研究，发表了《夏史初曙》一文（《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3 期），他认为“夏文化的中心地带现已查明”，“夏史已见曙光”。为此，他提出应把重点放在夏史研究方面。徐老为拓展夏史研究思路，启发研究者去考虑，“至于夏王朝疆理所及，声教所及，到达些什么地方呢，这在旧文献中还有一些记录可供参考”。他还根据文献线索，认为成汤灭夏，促使夏民族大迁徙。他提出“夏商之际夏民族一部分北迁为匈奴，一部分南迁于江南为越”。“韦顾既伐”后，也都北迁，“韦即豕韦省称”，“豕韦北迁后又称室韦或失韦”。这些看法，在他后来撰著的《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 年）中继续得到阐发和丰富。

李学勤先生较早注意到夏文化问题。他在《新建设》1958 年第 8 期上发表了《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社会》（原题“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文中提出：“在郑州商族文化层与龙山文化层重叠时，其间每每夹有无文化遗物的土层，表明两者不相衔接。在洛达庙、南关外、□旮王等地果然发现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文化层，我们称之为‘南关外期’或‘洛达庙期’。它们更接近龙山文化，

而有其特异点，如南关外期的棕色陶器、洛达庙期无鬲类空足器等。这两期都早于二里岗下期，最可能是夏代的。”这里讲的“洛达庙期”文化，就是后来大家通称的二里头文化。

后来，随着考古和古文字资料的不断发现，针对国内外古史研究的现状，他提出：“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①先生的这一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愈益表明它对中国早期文明史研究的先导意义。

关于夏史研究，李学勤先生还发表了《〈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②和《郭沫若先生对夏代的研究》③等。前文肯定了古本《竹书纪年》从世系、事迹、都邑、年代等四方面证实夏史的史料价值，有“珍贵的内涵”，但同时也提出它受时代色彩和思想倾向的局限，我们对它也不能全信。而后文则肯定了郭老对夏史研究的先启作用。

刘起釪先生是顾颉刚先生的弟子之一，他协助顾先生晚年做《尚书》整理工作，并自撰《古史续辨》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书中有专篇研究《尚书·禹贡》和《甘誓》中的疑难问题，且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还对夏族原居地进行了缜密考证，提出夏文化始于晋南说。刘先生的作品继承了《古史辨》学派的文脉。

李民先生是当代研究夏史的史学专家之一，他著《尚书与古史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夏商史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两书运用《尚书》虞夏书文献来研究夏史，取得了令人瞩

① 李学勤. 走出疑古时代.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19.
② 李学勤.《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 // 本书编委会. 华夏文明：第1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③ 郭沫若先生对夏代的研究. 中国史研究，1992(3).

目的成果。

郑杰祥先生是研究夏史和夏文化成果颇丰的专家之一，他因亲自参加过夏文化考古发掘，又熟悉夏史有关文献资料，已有多部论著发表。他的《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是我国第一部有分量的系统研究夏史和夏文化的专著。该书分夏代历史简论和夏代文化探索两部分。内容翔实，其中不乏许多独到见解，对夏史研究做出了贡献。另外，郑先生的新著《新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也已面世，这是一项把新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联系起来考察的新成果。

最后不能不提孟世凯先生的《夏商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年）和孙淼先生撰著的《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 年），前书通俗生动、雅俗共赏，又不失其学术性，在面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后书的上篇夏代史，占 236 页，分量不轻。该书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就夏史和夏文化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见解，是一部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同时可作为历史考古专业大学生、研究生的自学教材。

另外，与夏史有关的研究专著还有：谢维扬的《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梁颖、李庭华的《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道路与形态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高光晶的《中国国家起源》（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年）、《中国国家起源及形成》（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张广志、李学功的《三代社会形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周书灿的《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 年），晁福林的《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白钢主编，王宇信、杨升南著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二卷先秦（人民出版社，1996 年），宋镇豪的《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姚政的《先秦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